



《韩诗》与讖纬关系新考

曹建国 张莉莉

摘要: 汉代《诗》学派别中,《韩诗》与讖纬关系最为密切。不仅表现在《韩诗》学者中通讖者远多于其他三家,其《诗》学说解也与讖纬关系密切。《韩诗》之所以与讖纬关系密切,既有时代因素,也有其学派自身的原因,尤其与《韩氏易》有某种内在的关联。因为与讖纬关系密切,这为《韩诗》在东汉的兴盛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。

关键词: 《韩诗》; 薛汉; 讖纬

在一般的学术史描述中,都会把《齐诗》和讖纬联系起来。尤其是清代的三家《诗》辑佚,几乎都是把《诗纬》归入《齐诗》。陈乔枬认为,“夫齐学湮而《诗纬》存,则《齐诗》虽亡而犹未尽泯也。《诗纬》亡,而《齐诗》遂为绝学矣。”^①廖平在早些年作《诗经》与《易经》的注解时,也认为《诗纬》属于《齐诗》学。后来他作《诗纬新解》时观点发生了变化,认为“《诗纬》者,诗之秘密微言也,每以天星神真说诗”,与《齐诗》不完全是一回事^②。但现代《诗经》学研究似乎并没有采纳廖平的意见,大多数学者仍然承袭清代学者的观念,把《诗纬》与《齐诗》等同起来,例如夏传才的《诗经研究史概要》^③。当然,也不排除少数例外,如曹建国和王长华^④。

不过,我们并不能完全割断《齐诗》乃至整个汉代《诗》学与《诗纬》,乃至广泛意义上讖纬之间的联系。事实上,在讖纬流行尤其在以纬决经的东汉,任何一家学术都不能完全摆脱与讖纬的关联。然而就汉代《诗》学而言,如仔细排比便可知,东汉时期与讖纬关系更为密切的应该是《韩诗》,而不是通常认为的《齐诗》。

一、《韩诗》学者通讖人物考

薛汉 薛汉可以说是整个东汉时期最著名的《韩诗》学者,不仅门徒众多,他的《韩诗薛君章句》也流传很广。《后汉书·儒林列传》有传,文曰:

薛汉字公子,淮阳人也。世习《韩诗》,父子以章句著名。汉少传父业,尤善说灾异讖纬,教授常数百人。建武初,为博士,受诏校定图讖。当世言《诗》者,推汉为长。永平中,为千乘太守,政有异迹。后坐楚事辞相连,下狱死。弟子犍为杜抚、会稽澹台敬伯、钜鹿韩伯高最知名。^⑤

① 陈乔枬:《诗纬集证》,载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77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,第761页。

② 廖平:《六译馆丛书·诗说》,民国七年(1918)四川存古书局印本。

③ 夏传才:《诗经研究史概要》,中州书画社1982年,第74~75页。

④ 曹建国:《诗纬论诗》,载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》2004年第24辑;王长华、刘明:《〈诗纬〉与〈齐诗〉关系考论》,载《文学评论》2009年第3期。

⑤ 《后汉书》,中华书局1965年,第2573页。

钱大昕据《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称,薛汉父名方丘,字夫子^①。而《隋书·经籍志》载《韩诗》22卷,薛氏章句。惠栋曰:“唐人所引《韩诗》,其称‘薛君’者,汉也;称‘夫子’者,乃方丘也。故《冯衍传》注有薛夫子章句是也。传不载汉父名字,后人以章句专属诸汉,失之。”^②薛汉本传称其传父业,并且“尤善说灾异讖纬”,则薛夫子极有可能也善说灾异图讖。考薛汉建武初为博士,则薛方丘、薛汉父子当为两汉之交人。其时图讖之学方兴,薛氏父子精于图讖亦在情理之中。据此以论,则薛方丘、薛汉父子皆通讖纬之学。

薛汉本传记载他的学生中著名者有杜抚、澹台敬伯和韩伯高。据《后汉书·廉范传》记载,廉范曾受学于薛汉^③。《东观汉记》记载,尹勤曾学于薛汉,尹勤在延平元年受封为司空。薛汉弟子中,杜抚学问最显。《后汉书·儒林列传》有杜抚传,据传文知杜抚定《韩诗章句》,另作《诗题约义通》,世称“杜君法”。不仅如此,杜抚亦弟子千人,著名者如赵晔、冯良等。其中赵晔作《诗细历神渊》,蔡邕叹服,以为长于王充《论衡》^④。

郅恽 郅恽,《后汉书》有传。据本传,知恽字君章,汝南西平人。12岁丧母,及长受《韩诗》与《严氏春秋》,明天文历数。所谓《严氏春秋》之严氏乃严彭祖,《汉书·儒林传》记载他和颜安乐一起师事齐学大师眭孟受《公羊春秋》^⑤。故《严氏春秋》天生便有阴阳五行的基因,而郅恽的学说也难以摆脱其影响。据《后汉书·郅恽传》记载,“王莽时,寇贼群发,恽乃仰占玄象,叹谓友人曰:‘方今镇、岁、荧惑并在汉分翼、轸之域,去而复来,汉必再受命,福归有德。如有顺天发策者,必成大功。’”于是他便上书王莽,曰:“臣闻天地重其人,惜其物,故运机衡,垂日月,含元包一,甄陶品类,显表纪世,图录豫设。汉历久长,孔为赤制。”所以劝王莽退归臣位,还政于刘氏,与其师祖眭孟当初劝汉昭帝退位让贤如出一辙。尽管王莽大怒,但因为郅恽是根据讖纬立论的,“难即害之”,故而王莽派人告诉郅恽,让他装疯卖傻以免治其罪,这样双方都有一个台阶下。可郅恽偏偏不领情,说自己“所陈皆天文圣意,非狂人所能造”^⑥。幸而后来遇天下大赦,他才得以免除牢狱之灾。

史称郅恽曾教授太子《韩诗》,此太子乃废皇后郭后之子刘强,后徙封东海王。

廖扶 据《后汉书·方术列传》记载,廖扶字文起,汝南平舆人。习《韩诗》《欧阳尚书》,专精经典,尤明天文、讖纬、风角、推步之术。教授弟子常数百人,有名者如汝南郡太守谒焕。

唐檀 唐檀字子产,豫章南昌人。据《后汉书·方术列传》记载,其少年时游学京师,习《京氏易》《韩诗》和《颜氏春秋》,尤好灾异星占。檀著书28篇,名为《唐子》,亡佚。

公沙穆

公沙穆 《后汉书·方术列传》有传。穆字文义,北海胶东人,少贫贱,长习《韩诗》《公羊春秋》,尤锐思《河》《洛》、推步之术。曾为掾侯刘敞相,后迁弘农令。史书记载他为弘农令时,为消弭螟虫之害曾设坛作法,求得暴雨以去虫害。

武梁 武梁是著名的武梁祠的墓主。洪适《隶释》卷六载《从事武梁碑》:

故从事武掾,掾讳梁,字綏宗。掾体德忠孝,岐嶷有异。治《韩诗经》,闕愤传讲,兼通《河》《洛》、诸子、传记。广学甄彻,穷综典□,靡不□览。州郡请召,辞疾不就。安衡门之陋,乐朝闻之义。诲人以道,临川不倦。耻世雷同,不窥权门。年逾从心,执节抱分,终始不貳,弥弥盖(益?)固。大位不济,为众所伤。年七十四,元嘉元年季夏三日,遭疾陨灵。呜呼哀哉!孝子仲章、季章、季立,孝孙子侨,躬修子道,竭家所有,选择名石,南山之阳,擢取妙好,色无斑黄。前设坛墀,后建祠堂。良匠卫改,雕文刻画,罗列成行。摅骋技巧,委蛇有章。垂示后嗣,万世不亡。其辞曰:懿德玄通,幽以明兮;隐居靖处,休曜章兮;乐道忽荣,垂兰芳兮;身歿名存,

①王先谦:《后汉书集解》,中华书局1984年,第900页。

②王先谦:《后汉书集解》,第900页。

③《后汉书》,第1101页。

④《后汉书》,第2575页。

⑤《汉书》,中华书局1962年,第3616页。

⑥《后汉书》,第1024~1025页。

□□□□。①

刘宽 刘宽，字文饶，弘农华阴人。据谢承《后汉书》记载，刘宽少学《欧阳尚书》、《京氏易》，尤明《韩诗外传》。星官、风角、历算等术皆究极师法，号为通儒②。范曄《后汉书》有传。

郑玄 作为汉代贯通今古文经学的大家，郑玄先从第五元先学《京氏易》《公羊春秋》《三统历》《九章算术》，又从东郡张恭祖受《周官》《礼记》《左氏春秋》《韩诗》《古文尚书》。《后汉书》本传记载郑玄遍注群经，其中便有《中候》《乾象历》之类的纬书，而《隋书·经籍志》称郑玄曾注群纬。文献没有记载郑玄是从何人学习讖纬之学，张恭祖授予郑玄的学问除《韩诗》《礼记》外，其余皆为古文经学。相较而言，第五元先授郑玄讖纬之学的可能性比较大，究其实而言，《京氏易》原本等同纬书，而《公羊春秋》《三统历》《九章算术》也和讖纬之学关系密切。所以他跟随马融学习时，马融集诸生校订图讖，因为郑玄精于历算便让其助算。而我们也可以据此推断，当郑玄从张恭祖受《韩诗》时，应该已通晓讖纬之学了。

杜琼 杜琼，字伯瑜，蜀郡成都人。琼少学于任安，尽传安术。据载，杜琼著有《韩诗章句》十余万言。杜琼既然问学于任安，当亦通晓讖纬。因为《后汉书·儒林列传》记载任安向杨厚学习图讖，并“究极其术”③，想来任安也应是一个通讖人物。而杜琼能尽传任安学术，他也应该通讖纬之学。

何随 何随，字季业，蜀郡郫人。治《韩诗》《欧阳尚书》，精研文纬，通晓星历，著《谭言》十篇。

二、《韩诗》说解与讖纬

《韩诗》通讖的学者，许多人都有《诗经》诠释之作。但这些著作大部分亡佚了，保存最多的当属薛方丘、薛汉父子的《韩诗薛君章句》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《韩诗》学派的著述曰：“《韩诗》二十二卷，汉常山太傅韩婴撰，薛氏章句。”那么这里提到的22卷《韩诗》应当就是《韩诗薛君章句》，或许它就是薛汉的学生杜抚所删定之《薛君章句》。马国翰根据新、旧《唐书》记载《韩诗》不提“薛君”或“薛氏”，断定《隋志》记载之《韩诗薛君章句》至此已经散佚。其实未必。一个显著的例子是《经典释文》《文选》李善注以及《艺文类聚》《太平御览》等在引用《韩诗》《韩诗薛君章句》时，称名并不严格区分。例如《艺文类聚》卷4解释三月三日上巳节曰：“《韩诗》曰：三月桃花水之时，郑国之俗，三月上巳，于溱、洧两水之上，执兰招魂续魄，拂除不祥。”④这应该是对《溱洧》的解说。但同样的内容，《后汉书·袁绍传》李贤注却注明引自《韩诗薛君章句》⑤。甚至同一本书征引相同内容，书名也会不同。同样对三月上巳节郑国之俗的解说，李贤注《后汉书·礼仪志》引差不多相同的内容却注明出自《韩诗》⑥。这样的情况在李善注《文选》时更为普遍，如注潘安《关中诗》“尸素以甚”和曹植《求自试表》“《诗》之‘素餐’，所由作也”，都征引了《韩诗》对《魏风·伐檀》的解说，但所注出处，一为《韩诗薛君章句》，一为《韩诗》⑦。另外，但凡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所引《韩诗》，同样的内容李善注《文选》皆曰《韩诗薛君章句》。所以新、旧《唐书》列《韩诗》不言“薛君”或“薛氏”，并不能证明此《韩诗》不是《韩诗薛君章句》，更不能据此断言《薛君章句》已经散佚。到了宋初，李昉等人编纂《太平御览》，还大量征引《韩诗薛君章句》，证明此书宋初尚在流传。同时，根据唐宋人征引《韩诗》与《韩诗薛君章句》的情况，我们也可以推断，魏晋以来，尤其是唐宋间文献征引之《韩诗》大多应该是《韩诗薛君章句》的省称，而非韩婴之《韩诗》。

我们今天看到《文选》李善注、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、欧阳询《艺文类聚》等书征引《韩诗薛君章句》绝大多数为词语训诂，其间看不出多少讖纬的影响或印痕。但这应该不是《韩诗薛君章句》的完整显现，因为单纯的词语训诂与经学诠释意义之“章句”体例不合。所谓章句，简言之便是首先分章析句（此即刘师培《国语发微》所说的“章句之体，乃分析经文之章句者也”）。这里的“句”并非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句子，而

①洪适：《隶释·隶续》，中华书局1986年，第74～75页。

②《后汉书》，第886页。

③《后汉书》，第2551页。

④《艺文类聚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，第62页。

⑤《后汉书》，第2382页。

⑥《后汉书》，第3111页。

⑦《文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，第939、1676页。

是指语气的停顿),然后便根据分章析句的结果,依照句、章之文意脉络对文辞训诂、句义和章旨进行辨析解说。焦循曰:“既分其章,又依句敷衍而发明之,所谓‘章句’也。章有其旨,则总括于每章之末,是为‘章旨’也。叠诂训于语句之中,绘本义于错综之内。”^①所以章句之体皆有词语训诂、句义分析,此为汉代章句学之通义。这一点参诸王逸《楚辞章句》、赵岐《孟子章句》并不难理解。至于经传之合而为一或受马融之影响,“章旨”之归纳或为赵岐之独到发明,故其于《孟子章句·自叙》中特别提出“具载本文”、“章别其旨”二事。缘此,我们认为《韩诗薛君章句》除文辞训诂之外,定然有句义、文义之诠释与引申。这一点,我们尚可以从古文献中寻得蛛丝马迹,并于其中看出谶纬对薛君《韩诗》诠释的浸染。兹举几例:

其一、《后汉书·明帝纪》记载汉明帝永平八年,日食,汉明帝下诏让大臣“极言得失”。看过群臣奏疏以后,汉明帝又下了一道自责诏书。文曰:

群僚所言,皆朕之过。人冤不能理,吏黠不能禁;而轻用人力,缮修宫宇,出入无节,喜怒过差。昔应门失守,《关雎》刺世;飞蓬随风,微子所叹。永览前戒,竦然兢惧。徒恐薄德,久而致怠耳。^②

明帝诏书中所谓“应门失守,《关雎》刺世”乃以谶纬说诗,并且用的是《韩诗》说。《春秋说题辞》曰:“人主不正,应门失守。故歌《关雎》以感之。”宋均注曰:“应门,听政之处也。言不以政事为务,则有宣淫之心。《关雎》乐而不淫,思得贤人与之共化,修应门之政者也。”^③关于《关雎》诗旨,《毛诗序》以为是歌咏后妃之德的美诗。《鲁诗》认为是刺周康王迷恋女色之诗,《汉书·杜钦传》:“迹三代之季世,览宗、宣之饗国,察近属之符验,祸败曷常不由女德?是以佩玉晏鸣,《关雎》叹之。知好色之伐性短年,离制度之生无厌,天下将蒙化,陵夷而成俗也。”李奇曰:“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,周康王后不然,故诗人叹而伤之。”臣瓚曰:“此《鲁诗》也。”^④《后汉书·杨赐传》曰:“康王一朝晏起,《关雎》见几而作。”李贤注引晋灼《汉书音义》:“后夫人,鸡鸣佩玉去君所。周康王后不然,故诗人叹而伤之。此事见《鲁诗》,今亡失也。”^⑤《齐诗》认为《关雎》关乎夫妇人伦之端始,《汉书·匡衡传》:“臣又闻之师曰:‘妃匹之际,生民之始,万福之原。’婚姻之礼正,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。孔子论《诗》以《关雎》为始,言太上者民之父母,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,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。故诗曰:‘窈窕淑女,君子好仇。’言能致其贞淑,不贰其操,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,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,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。”^⑥匡衡从后苍学《齐诗》,其说《关雎》当然是《齐诗》义。《韩诗》说《关雎》首见于《韩诗外传》,其卷5第1章记载子夏问孔子“《关雎》何以为《国风》始”义,借孔子口说出《关雎》“乃天地之基地”的意义。^⑦然而《韩诗外传》乃汇编之书,虽然也能看出韩婴对《关雎》之义的观点,但比之《内传》或有不同。《后汉书·冯衍传》“美《关雎》之识微兮,愍王道之将崩”,李贤注引薛夫子《韩诗章句》曰:“诗人言雎鸠贞絜,以声相求,必于河之洲,蔽隐无人之处。故人君动静,退朝入于私宫,妃后御见,去留有度。今人君内倾于色,大人见其萌,故咏《关雎》,说淑女,正容仪也。”^⑧是薛夫子《韩诗章句》认为《关雎》是刺世之诗,与《鲁诗》相类。而这相较于《韩诗外传》,无疑更能代表《韩诗》的《诗》经说传统。

回到汉明帝的《诗》说上来。当明帝说“应门失守,《关雎》刺世”的时候,李贤注一方面征引《春秋说题辞》表明明帝《诗》说与谶纬之间的关系,然后又征引《韩诗薛君章句》表明其《诗》说传统。《韩诗薛君章句》曰:“诗人言雎鸠贞絜慎匹,以声相求,隐蔽于无人之处。故人君退朝,入于私宫,后妃御见有度,应门击柝,鼓人上堂,退反宴处,体安志明。今时大人内倾于色,贤人见其萌,故咏《关雎》,说淑女,正容仪,以刺时。”比较《汉书·冯衍传》引薛夫子说与《后汉书·明帝纪》薛汉说,大抵也可以看出他们父子间的承传。除了其中说应门的一段,其余几乎相同。而这段“应门”说当来自谶纬学说,与薛汉“善说灾异谶

①焦循:《孟子正义》,中华书局1987年,第27页。

②《后汉书》,第111页。

③《后汉书》,第112页。

④《汉书》,第2670页。

⑤《后汉书》,第1777页。

⑥《汉书》,第3342页。

⑦许维通:《韩诗外传集释》,中华书局1980年,第164~165页。

⑧《后汉书》,第995页。

纬”的治学经历相应。同时也说明就讖纬学说而言,薛汉说《诗》之讖纬特色更甚于乃父。

还有一事需要注意。郅恽曾授东海王刘强《韩诗》,恽通讖纬,其《诗》说浸染讖纬之说也在情理之中。不知明帝以讖说《诗》,是否与郅恽有关。

其二,东汉灵帝光和元年,有虹霓白日降于嘉德殿前。光禄大夫杨赐上书曰:

国家休明,则鉴其德;邪辟昏乱,则视其祸。今殿前之气,应为虹蜺,皆妖邪所生,不正之象,诗人所谓蜺蜺者也。于《中孚》曰:“蜺之比,无德以色亲。”方今内多嬖倖,外任小臣,上下并怨,喧哗盈路,是以灾异屡见,前后丁宁。今复投蜺,可谓孰矣。案《春秋》曰:“天投蜺,天下怨,海内乱。”加四百之期,亦复垂及。昔虹贯牛山,管仲谏桓公无近妃宫。^①

杨赐这段上书集中征引了《易稽览图》《中孚》《春秋演孔图》《春秋文耀钩》等纬书,以解说虹的政治预言功能。尤其是他在征引诸纬书之前先引了《蜺蜺》,很显然他是以讖言解说《蜺蜺》。《毛诗》说《蜺蜺》曰:“止奔也。”又曰:“夫妇过礼则虹气盛。君子见戒而惧,讳之,莫之敢指。”而按照孔颖达的说法,所谓的“夫妇过礼”就是夫妇不以道结合而妄淫行夫妇之事^②。可见《毛诗》只是就夫妇之礼、婚姻之义为说。而《韩诗》则不然。李贤注引《韩诗序》曰:“《蜺蜺》,刺奔女也。蜺蜺在东,莫之敢指,诗人言蜺蜺在东者,邪色乘阳,人君淫佚之徵。臣子为君父隐臧,故言莫之敢指。”^③与《毛诗》相比较,《韩诗》以阴阳五行说解,视虹为灾异之表征,完全是政治比附模式,与杨赐所引纬书没有差别。

文献并没有记载杨赐的《诗》学派属,只是记载他传习家业。而他祖父杨震从太常桓郁受《欧阳尚书》,他的父亲杨秉兼明《京氏易》,那么杨震可以认为是以《欧阳尚书》《京氏易》名家。但清代三家诗辑佚学认为杨震学《鲁诗》,理由是他曾经和蔡邕一起共同刊定《鲁诗》石经^④。其实,这样的判定并没有多大根据。退一步说,就算杨赐是《鲁诗》学者,他也可能在奏书中用《韩诗》,就如杜钦既用《鲁诗》又用《韩诗》一样^⑤。而我们这样说的另一个理由是,杨赐此说与《易林》相同。《易林·蛊之复》:“蜺蜺充侧,佞人倾惑,女谒横行,正道拥塞。”又《易林·无妄之临》与《震之井》与此相同^⑥。《易林》的作者或以为是焦延寿,或以为是崔篆,其中大量引用《诗经》。有学者考证,《易林》说《诗》更接近于《韩诗》,而非学术史一般认为的《齐诗》^⑦。所以,我们更倾向于杨赐说《蜺蜺》乃是本《韩诗》为说。

其三,张华《情诗》“巢居知风寒,穴藏识阴雨”,李善注:“《春秋》汉含孳曰:穴藏先知雨,阴暄未集,鱼已噉喙。巢居之鸟先知风,树木摇,鸟已翔。《韩诗》曰:鹤鸣于垤,妇叹于室。薛君曰:鹤,水鸟。巢处知风,穴处知雨。天将雨而蚁出壅土,鹤鸟见之,长鸣而喜。”^⑧李善所引《春秋》汉含孳的内容也见于《春秋佐助期》,见载于《北堂书钞》。两者的不同在于,《北堂书钞》同时还有宋均的注:“鱼,小鳞;鸕,小鸟。噉,翔,皆乱动也。”^⑨又《春秋说题辞》:“鹤知夜半。”注曰:“鹤,水鸟也。夜半水位感其生气,则益喜而鸣。”^⑩

通过以上三例,我们大抵可以看出《韩诗》说解所受讖纬之影响。不仅如此,一些《韩诗》学者著述的书名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。赵晔是薛汉的再传弟子,著有《诗细历神渊》。或以为《诗细历神渊》系两部书,即《诗细》和《历神渊》,其中《历神渊》又写作《诗神泉》。《三国志·虞翻传》裴松之注引《会稽典录》记载,初平末年,虞翻为会稽太守王朗功曹,其在对王朗问时说:“有道山阴赵晔,徵士上虞王充,各洪才渊懿,学究道源,著书垂藻,骆驿百篇,释经传之宿疑,解当世之盘结,或上穷阴阳之奥秘,下据人情之归极。”^⑪其中“阴阳之奥秘”云云,颇为耐人寻味,极有可能关乎讖纬之学。因为虞翻本人于前人注经,颇

①《后汉书》,第1779~1780页。

②孔颖达:《毛诗正义》,中华书局1980年,第318页。

③《后汉书》,第1781页。

④王先谦:《诗三家义集疏》,中华书局1987年,《序例》第7页。

⑤《汉书》,第2677页。

⑥徐传武、胡真:《易林汇校集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,第699、948、1900页。

⑦张玖青:《论〈易林〉的〈诗〉说》,载《文学评论》2010年第2期。

⑧《文选》,第1369页。

⑨安居香山、中村璋八:《纬书集成》,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,第823页。

⑩安居香山、中村璋八:《纬书集成》,第865页。

⑪《三国志》,中华书局1959年,第1325页。

为重视讖纬之说。《三国志》本传裴松之注引《虞翻别传》记载,他在完成《周易》注后的上书中说:“前人通讲,多玩章句,虽有秘说,于经疏阔。”“秘说”即讖纬之说,可见他对注经用讖纬之说的态度。王充的《论衡》中也有很多内容关涉到讖纬,尤其是汉代受命之说^①。因此我们认为虞翻如此高度评价赵晔、王充的著述,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就是其中的“秘说”等神奇之说。清代惠栋曰:“《经籍志》云,梁有有道徵士赵晔《诗神泉》一卷,以历言《诗》,犹《诗纬》之《汎历枢》也。”^②

至于郑玄以讖纬之学笺注《毛诗》,其中有多少涉及《韩诗》,抑或是秉持《韩诗》传统,因文献阙载,难以遽论,故不再讨论。但通过以上论述,已可以确证《韩诗》说解,尤其是东汉以后的《韩诗》说解与讖纬之学有密切关系。

三、《韩诗》以讖说《诗》之成因

在讨论了《韩诗》派通讖人物及其《诗》解中的讖纬因子之后,我们想追问的是,为什么《韩诗》学者如此热衷讖纬?以讖说《诗》的诠释特征对《韩诗》学派产生了怎样的影响?今文三家诗,《韩诗》最后亡,与此有没有关联?下面试作分析阐述。

首先我们看《韩诗》学者是如何热衷讖纬,这需要和同时代的其他《诗》学派别作一横向比较。为此,我们列一幅两汉三国时期《诗》学承传的图表。首先需要说明的是,下表数据主要依据唐晏《两汉三国学案》^③、徐玉立《汉碑全集》^④以及其他相关材料。

就表1中的数据看,《韩诗》学者通讖人物最多,尤其多于今文鲁、齐两家。为什么?仅仅以汉代尤其是东汉学者迎合政治需求为由,似乎不足以完全深入地说明问题,我认为这或许是《韩诗》固有的学说传统。关于这一点,我们可以从《韩诗外传》找到一些旁证。兹举两例。

《韩诗外传》卷8:“三公者何?曰司马,司空,司徒也。司马主天,司空主土,司徒主人。故阴阳不合,四时不节,星辰失度,灾变非常,则责之司马。山陵崩竭,川谷不流,五谷不植,草木不茂,则责之司空。君臣不正,人道不合,国多盗贼,下怨其上,则责之司徒。”^⑤此是以灾异说《诗》。

《韩诗外传》卷8:“黄帝即位,施惠承天,一道修德,惟仁是行,宇内和平,未见凤凰,惟思其象。夙寐晨兴,乃召天老而问之曰:‘风象何如?’天老对曰:‘夫凤之象,鸿前而麟后,蛇颈而鱼尾,龙文而龟身,燕颌而鸡喙,戴德负仁,抱中挟义。小音金,大音鼓。延颈奋翼,五彩备明。举动八风,气应时雨。食有质,饮有仪。往即文始,来即嘉成。惟凤为能通天祉,应地灵,律五音,览九德。天下有道,得凤象之一,则凤过之。得凤象之二,则凤翔之。得凤象之三,则凤集之。得凤象之四,则凤春秋下之。得凤象之五,则凤没身居之。’黄帝曰:‘于戏!允哉!朕何敢与焉。’于是黄帝乃服黄衣,带黄绅,戴黄冕,致斋于中宫。凤乃蔽日而至。黄帝降于东阶,西面,再拜稽首曰:‘皇天降祉,敢不承命!’凤乃止帝东园,集帝梧桐,食帝竹实,没身不去。诗曰:‘凤凰于飞,翺翺其羽,亦集爱止。’”^⑥此又是以祥瑞说诗,其中黄帝与天老对话这样的情节也常见于纬书。

《后汉书·郎顗传》:“四始之缺,五际之戾,其咎由此。”李贤注:“四始谓《关雎》为《国风》之始,《鹿鸣》为《小雅》之始,《文王》为《大雅》之始,《清庙》为《颂》之始。缺犹废也。《翼奉传》曰:‘易有阴阳五际。’孟康曰:‘《韩诗外传》云:“卯、酉、午、戌、亥也,阴阳始终际会之岁,于此则有变改之政。”’”^⑦但据《汉书·翼奉传》,李贤所引孟康注与此不同。《汉书·翼奉传》曰:“《易》有阴阳,《诗》有五际,《春秋》有灾异,皆列终始,推得失,考天心,以言王道之安危。”而关于何谓“五际”,应劭曰:“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也。”孟康曰:“《诗内传》曰:‘五际,卯、酉、午、戌、亥也。阴阳始终际会之岁,于此则有变改之政

① 龚鹏程:《汉代思潮》(增订版),商务印书馆2008年,第197~239页。

② 王先谦:《后汉书集解》,第901页。

③ 唐晏:《两汉三国学案》,中华书局1986年。

④ 徐玉立:《汉碑全集》,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。

⑤ 许维遹:《韩诗外传集释》,第290~291页。

⑥ 许维遹:《韩诗外传集释》,第277~279页。

⑦ 《后汉书》,第1069页。

也。”^①

表 1 两汉三国《诗》学传承表

诗派	学者数	西汉	东汉	三国	文献确载通讖人数	亡佚时间	备 注
鲁诗	60	44	16			西 晋	司马迁、王逸、蔡邕、王符、徐干、高诱等诗学传授不明,或可不归入诗派或归入其他诗派。如蔡邕从胡广受学,但胡广不是《鲁诗》学者。高诱从卢植受学,卢植自述从马融受古学,尝论《毛诗》当立博士。所以如果说卢植属《毛诗》,则高诱亦当归入《毛诗》学派。
齐诗	26	16	10		2	三 国	1. 齐学与《齐诗》有关系,但并不能等同,尤其不能将《公羊春秋》等同《齐诗》。所以把董仲舒、桓宽等归入《齐诗》派并没有多少道理。而班固归入其中也非常勉强。 2. 按照张衡的说法,哀平之前不该有讖纬之士,但翼奉确实非常特殊。翼奉之外,还有景鸾。
韩诗	64	12	48	4	10	两宋之交	1. 《两汉三国学案》记载蔡邕、蔡义实为一人。 2. 根据《汉碑全集》与洪适《隶释》,增加孟孝琚、渡君和度君、郎中马江、冯涣。邳恽授东海王刘强,廖扶授汝南郡太守谒煥,傅燮从刘宽学,王阜师从犍为杨定。据《后汉纪》补朱勃。 3. 我们认为薛汉及其弟子皆当通讖,因为从薛汉→杜抚→赵晔这一承传中,可以看出一以贯之的学术传统。 4. 《韩诗》通讖学者已见上文。
毛诗	38	8	9	21	6	流传至今	《毛诗》通讖人物,其中郑玄分属韩、毛,尹敏学《毛诗》但并不以《诗》名家。除此之外,尚有贾逵、许慎、马融、尹珍。
学派不明	14	3	10	1	2		1. 根据《汉碑全集》增加夏承、赵宽、潘乾等人。 2. 通讖人物翟酺、隗禧。

比较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所引孟康注,我们有以下几个疑问。一是孟康注中提到的《韩诗外传》和《诗内传》哪部书更准确?《诗内传》是一部什么样的书?据《汉书·翼奉传》,李贤所谓“《易》有阴阳五际”引述并不准确。而颜师古除了引孟康注外,还引了应劭注。所以我们倾向于颜师古所引孟康注(即关于“五际”的那段解释)是出自《诗内传》。那么《诗内传》是部什么样的书呢?我们曾经认为《诗内传》是《诗纬》的别称,理由是纬书在汉代被称为秘经^②。但仔细探究,这种说法其实有不周全之处。孟康并不是汉代人,而建安时期已经开始科禁内学^③,他也许不会称《诗纬》为内传。而我们根据李贤注,认为这里的“内传”极有可能是《韩诗内传》。因为李贤的注释中,他解释“四始”用的不是《毛诗》的说法,应该采用的是《韩诗》的说法。那么他引述的《韩诗外传》,要么是《韩诗传》,要么是《韩诗内传》。对照《汉书·翼奉传》孟康注,我们认为《韩诗内传》的可能性较大。但无论是《韩诗传》还是《韩诗内传》,这充满天道循环意味的说法都可证明《韩诗》原本的天学意味。后来纬书中关于“四始五际”的内容很多。“五际”与“四始”理论一样,原本应该是《诗》家之通义,只是各家说解各不相同。《齐诗》“五际”关乎人情伦理^④,而《韩诗》的“五际”理论则与阴阳五行有关。如果仔细探究,我们就不能不考虑到《韩氏易》的问题。

史书记载,《韩诗》学派创始人韩婴不仅传《易》,而且《韩氏易》易道深微。《汉书·儒林传》记载涿郡韩生语,以为《韩氏易》深于《韩诗》,且韩婴特意专门传授^⑤。徐复观认为《韩氏易》之深体现在其申发战国末期盛行的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,并且认为这也是导致《韩氏易》不传的原因^⑥。事情或不尽然,《韩

①《汉书》,第 3173 页。

②曹建国:《诗纬二题》,载《文学遗产》2010 年第 5 期。

③《三国志》,第 660 页。

④曹建国:《诗纬二题》,载《文学遗产》2010 年第 5 期。

⑤《汉书》,第 3614 页。

⑥徐复观:《两汉思想史》第 3 卷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,第 12 页。

氏易》所谓“深”或许是深微、精微的涵义,这正是汉代象数《易》学通行的特征。据此,则《韩氏易》与汉代其他学派的《易》学也没有太大的差别。《汉书》记载盖宽饶原本学《孟氏易》,后来喜欢涿郡韩生说《韩氏易》,便转而学《韩氏易》,或许因为《韩氏易》与《孟氏易》本来就有相通之处。史载孟喜得“《易》家候阴阳灾变书”,而这与上文征引《韩诗外传》中的祥瑞灾异确实有相同之处。阴阳灾异说《易》之外,孟喜又有卦气说,这与上引《韩诗内传》的“五际”说相通。

此外,我们说《韩氏易》乃至《韩诗》有阴阳灾异乃至有卦气说的特征,还可以从《韩诗》学者偏喜《孟氏易》《京氏易》方面得到证明。统计汉代《诗》《易》兼修的学者,我们发现《韩诗》学传人相较于其他三家《诗》学传人,尤其偏好《京氏易》《孟氏易》。《韩诗》学者通《京氏易》者为唐檀、刘宽、傅燮、张紘、田君、杜乔、韦著等,通《孟氏易》者有夏恭、夏牙、胡硕、杜琼(任安通《孟氏易》,而琼尽传安术)等。相比较而言,《鲁诗》通《京氏易》者只有李昺,《齐诗》未见明确记载,《毛诗》通《孟氏易》的有许慎、尹珍,通《京氏易》的有王肃。从比较的结果不难看出《韩诗》学派与《京氏易》《孟氏易》之间的关系。试想,这么多《韩诗》学者对《京氏易》《孟氏易》感兴趣,难道都是偶然的吗?我们认为,这极可能是二者的学术旨趣相近的结果。

所以,我们认为,《韩诗》学者热衷谶纬学说,既有时代因素,更有其学派自身的因素。《韩诗》中的固有的阴阳灾异因子乃至与卦气说的相通暗合之处,才是《韩诗》学者《诗》、纬兼治的深层原因。

四、《韩诗》派学者通谶之影响

唐晏认为“《鲁诗》行于西汉,而《韩诗》行于东汉”^①,单从人数来考量,似乎如此。但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的状况?这与谶纬有关吗?答案是肯定的。

整个西汉时期,《韩诗》学似乎并不怎么兴盛,并没有《韩诗》学者为帝王或诸侯王师。而同时的《鲁诗》派,申公学生王臧曾经作过景帝的太子少傅,也就是汉武帝的老师。王式作过短命皇帝刘贺的老师,高嘉和张游都以《鲁诗》授汉元帝,韦玄成和他的侄子韦赏则以《鲁诗》授汉哀帝。做过诸侯王老师的则有申公及其同门白生、穆生,韦孟和王式的学生唐生都做过楚王傅。《齐诗》学者伏理则授成帝。西汉丞相中,《韩诗》学者只有蔡谊(或作蔡义),《鲁诗》则有韦贤及其子韦玄成,《齐诗》则有匡衡。但就《汉书》记载详略而言,蔡谊显然非常简略。如果我们把博士讲论石渠阁代表一种话语权争夺的话,《鲁诗》派参加的学者有韦玄成、薛广德、张生、刘向,《齐诗》学者有萧望之,而《韩诗》学者则未见文献记载。

但到了东汉以后,情况发生了变化,《韩诗》地位骤然变得显赫起来。以《诗》学教授来看,郅恽以《韩诗》授光武太子强。只是后来因为郭后被废,太子强被改封为东海王。汉明帝是否学《韩诗》,史无明文,但其诏书用《韩诗》义。召驯侍讲汉章帝,并以《韩诗》教授章帝诸王。顺帝梁皇后通《韩诗》,其父梁商受《韩诗》。至于东汉时期《韩诗》学者之众多,已见上文,不赘言。尤其值得重视的是,建初四年,汉章帝下诏,令“太常,将、大夫、博士、议郎、郎官及诸生、诸儒会白虎观,讲议《五经》同异,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,侍中淳于恭奏,帝亲称制临决,如孝宣甘露、石渠故事,作《白虎议奏》”^②。不言而喻,白虎通会议的目的就是为了决《五经》同异以确立经学标准,经说被取就表明其获得经学权威的地位。《白虎通义》四次称引《韩诗》,而其他《诗》派未见明确引述。凡此种种,我们可以推断东汉时期的《韩诗》相较于其他《诗》学派别具有更加尊崇的地位,甚至可以被视作《诗经》学官学中的官学。

这是为什么?《鲁诗》兴起于西汉,《齐诗》西汉末尤其是在新莽时期更加得势,则《韩诗》为什么会取而代之?我们认为其中关键性的因素便是谶纬,而关键性的人物则是郅恽和薛汉。上文已经介绍,郅恽授《韩诗》兼通谶纬。而他最英勇的壮举动当是以谶责王莽,要其还政于刘氏,这为他争取到很大的政治资本,也是他后来能成为太子师的重要原因。不仅如此,因为他是《韩诗》学者,他的行为当然也会为《韩诗》争得很大的利益。东汉时期能以《诗》教授于宫廷的只有《韩诗》学者,便能说明这个问题。

当然,更重要的是薛汉,他不仅通谶,而且还为光武朝校订图谶。翻检《后汉书》《后汉纪》《东观汉

①唐晏:《两汉三国学案》,第299页。

②《后汉书》,第138页。

记》以及《八家后汉书辑注》，记载校定图讖次数最多的为《后汉书》。《后汉书》记载校定图讖次数有五次，其中苏竟与刘歆校定图讖当在新莽朝，而马融校定图讖当属私人行为，皆可不计。除此以外尚有三处，即薛汉校定图讖、尹敏校定图讖、班固与贾逵校定图讖。我们认为这三次中，尹敏和薛汉校定图讖当属于同一次，时间当在光武帝刘秀立国之初。《后汉书·尹敏传》记载：

帝以敏博通经记，令校图讖，使蠲去崔发所为王莽著录次比。敏对曰：“讖书非圣人所作，其中多近鄙别字，颇类世俗之辞，恐疑误后生。”帝不纳。敏因其阙文增之曰：“君无口，为汉辅。”帝见而怪之，召敏问其故。敏对曰：“臣见前人增损图书，敢不自量，窃幸万一。”帝深非之，虽竟不罪，而亦以此沉滞。^①

这段记载有两方面值得注意：其一是光武帝校定图讖的目的是为了除去与王莽有关的内容。王莽以符命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政治野心，这其中崔发等人功莫大焉，崔发被封为说符侯。与王莽类似，光武帝也是以符命起家，他自然深谙符命之于东汉朝的重要性。他之所以为儒者不信讖而大光其火，其原因就在于此，否定了符命也就等于否定汉王朝再受命以及他本人受命的合法性。所以这不是那些儒生眼中所谓的学术问题，而是关乎他本人及其所建立朝代的政治命运的问题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他要去除王莽符命的印痕，以保证自身的唯一合法性。后来，他要颁布图讖于天下，正是对其唯一合法性的再度强调。

其二是尹敏不信讖，他的增益行为也只能看做是另类的劝谏，光武帝“深非之”正是基于尹敏不信讖而作出的反应。与尹敏不同的是，薛汉信讖且擅长讖。这很关键。在为东汉王朝争得唯一合法性的同时，薛汉校订图讖也为自己的学说和学派获得了绝对的话语权。试想，王朝颁布的图讖便是出自薛汉等人之手，那么他们的图讖说解当然具有绝对的权威。薛汉以此来说《诗》，他的《诗》说当然是最权威也最符合当下政治需求的说解。这也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后来薛汉因为牵涉到楚王事被诛，但他的《韩诗章句》却仍然有极大的市场。可以说，薛汉作为东汉时期最著名的《韩诗》学者，为《韩诗》在东汉的兴盛立下了汗马功劳，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便是他掌握了讖纬这一绝对的话语权威。这也是《韩诗》在东汉以后仍能兴盛流传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尽管有点像身不由己的学术惯性在起作用。

可惜的是，尹敏不信讖，也不以《毛诗》名家。所以尹敏虽然是《毛诗》学者，大概也不会借助图讖以助益《毛诗》。相比之下，贾逵借助讖纬学说为《左传》争地位，就比尹敏聪明许多。后来的《毛诗》著名学者，除贾逵外，还有许慎、马融、郑玄等，无不精通讖纬，并将之运用于他们的经学说解中，自然对《毛诗》的兴盛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。

以上我们从人物、《诗》说、缘由及其影响等几个方面讨论了《韩诗》与讖纬之间的关系。概言之，东汉经学各家各派无不有通讖者，但面有宽有窄，人数有多有少，程度也有深有浅。就《诗》学言，《韩诗》在东汉时期借助薛汉的校订图讖获得权威地位，使之成为东汉《诗经》学官学中的官学。即便是古文《毛诗》兴起，它也以巨大的学术惯性向前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当然，这一问题非常复杂，比如《齐诗》恰恰因为讖纬而亡（因为它与新莽朝之间的瓜葛）。对此，我们将另文讨论，在此暂不展开。

●作者地址：曹建国，武汉大学文学院；湖北 武汉 430072。Email: caojgus@163.com。

张莉莉，武汉大学文学院；湖北 武汉 430072。

●基金项目：教育部社科规划一般项目(14YJA751001)；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(13BZW050)

●责任编辑：何坤翁

^①《后汉书》，第2558页。